

1870 年代西方旅人筆下的京都古寺 *

巫 佩 蓉**

摘 要

1870 年代，西方人士到亞洲旅行的風氣漸興，部分旅行者留下參訪京都古寺的記錄。本文以四位身分不同的西方人士書寫作為主要研究材料。旅人分別為奧地利前外交官胡伯納（Joseph Alexander Hübner，1811-1892）、法國商人與文化界人士杜黑（Théodore Duret，1838-1927）、英國設計師卓瑟（Christopher Dresser，1834-1904），與英國海軍建築師瑞德（Edward James Reed，1830-1906）。他們的書籍出版之時，詳盡的日本旅行手冊尚未刊行，日本官方文物保護制度也尚未成立，更無日本美術史、文化史的系統編纂。這些以西方語言書寫的寺院參訪記錄，正足以讓我們觀察具悠久歷史的京都佛寺與其文物，於現代社會中意義轉化的最初歷程。這些來自異文化圈之人士觀覽古文物的經歷與心得，讓我們觀察到，日本寺院建築或宗教物件，在明治時代初期，快速地被納入西方觀者的知識脈絡中，成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基於對歷史的探求，或對美感感知的興趣而觀覽的對象。

關鍵詞：京都寺院、旅行誌、東西文化交流、胡伯納、杜黑、卓瑟、瑞德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1879 年英國建築師所見的奈良與京都」（MOST 108-2410-H-008-032-MY2）之部分成果。感謝巫仁恕、馬孟晶對早期草稿的批評，也謝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謝謝計畫助理，也是我的學生林怡利、張育晴、謝宜君、劉思涵的協助。Covid-19 疫情期間，資料取得困難，謝謝楊雅琳的協助。

**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副教授。

Kyoto Temples Seen in the Western Travelogues of the 1870s

Wu, Pei-jung*

Abstract

It became popular for the Westerners to travel in Asia in the 1870s, and several travelogues record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Westerners' visits of ancient temples in Kyoto. This paper studies four cases of travelling writings, respectively by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1811-1892), a former Austrian diplomat, Théodore Duret (1838-1927), a French merchant and a man of the cultural circle,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a British designer, and Edward James Reed (1830-1906), a British naval architect. When they wrote and published their books, there were neither handbooks for traveling in Japan nor books of Japanese art history or cultural history. Official polic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heritage has not been well established yet. These writings deserve attention because they demonstrate how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temples were commented by the viewers from the Western World regarding the artifacts'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social and historical meaning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odern age.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the authors recorded their observations of the artifacts throughout their journeys illuminate how the Western viewers perceived Buddhist objects within their context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Buddhist temples in Kyoto experienced a rapid transformation when they became objects viewed with aesthetic or historical interest from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words: Kyoto temples, travelogue,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Théodore Duret, Christopher Dresser, Edward James Reed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壹、前言

今日，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個人信仰背景為何，不乏視古代佛寺為觀光景點，或是所謂的「文化遺產」，而將之列為休閒或探索異地文化之旅的目標。旅行者或預備旅行的人，固可透過與宗教有關的書去認識佛寺，但也可能選擇由其他類型的書籍，如旅行指南、遊記，或是美術史書，閱讀與古寺文物有關的內容。除了一般旅人之外，亦有心懷嚴肅目標的學者，將與佛教有關的文物，包括原先作為崇拜對象或儀式使用的雕像、聖物，以及佛教建築、附屬於建築的裝飾物件、擺設的器物、繪畫、庭院，甚至是寺院周圍的自然景觀等，視為審美對象、歷史文物或文化象徵，而加以研究分析。佛教寺院的存在意義，原本主要是為了當地的信徒。雖然自古以來，除了宗教信仰目的之外，拜訪佛寺也不排除有娛樂休憩或進行鑑賞活動的可能，但參與寺院活動者，仍以同一文化圈的人士為主。佛寺被視為世界上不同文化圈、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都有參觀價值的處所，實為近現代文化洗禮之後，社會賦予了觀覽佛教文物的新視角。

若擬探索東亞佛寺文物於時代脈絡中的意義變化，明治時代（1868-1912）的日本可提供諸多值得觀察的例子。由 1868 至 1912 四十五年間，日本經歷無數新舊文化的巨大衝突，浪潮此起彼落，起伏跌宕，決非單一線性發展。與佛寺有關者，如明治改元之前（1868），官方便發布了「神佛分離」的命令，改變了歷史上神道與佛教信仰長期混融的狀態，並使佛教地位受到壓抑。¹ 另一方面，明治四年（1871）太政官公告的「古器舊物保存方」，及明治五年（1872）5 月 15 日起，為期四個月的社寺寶物調查（王申檢查），又開啟保護文物的契機。² 值得注意的是，「神佛分離」雖非以貶抑佛教信仰為宗旨，實質上卻因獨尊神道與天皇的關聯，使佛寺整體地位一夕崩落，甚至造成部分寺院文物遭毀棄或變賣。而社寺寶物調查，雖有保護文物之意圖，但文物的定位並未因一次調查活動就立顯明晰，有系統的具體保護措施更有待多年發展，未能立刻上軌道。明治初期，具有悠久傳統的日本佛寺及其所屬文

¹ 慶應 4 年 3 月 13 日（1868 年 4 月 5 日），太政官布告「神佛判然令」，又稱「神佛分離令」。

² 関秀夫，《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 239。亦請參考：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頁 72-80。

物，無論就硬體上的維繫保存而言，或者就抽象的價值定位而言，實處於變動不定的微妙狀態。

就古代物件轉為現代社會下觀覽與認知標的物的議題，學界現有研究中，較多的論文在於探索明治時代官方的作為，如古物或寶物的調查、博物館的發展等。亦有諸多論文探討美術史學科的建立與發展。³ 就觀念的改變方面，最著名的研究在於探索「美術」一詞的新創及相關脈絡。⁴ 然而，無論是探索官方制度新訂、展館或展覽的籌辦、學科建立，或是新語彙的引進及編訂，都尚未能充分考察制度建立之前的紛雜狀況，也就是明治最初十餘年的發展。除此之外，就研究取徑而言，除了被收入博物館的物件之外，古代文物即使仍屬原來的藏處（如寺院），也因為觀覽的人員評價角度不同，而產生了新的意義。特別是來自不同文化圈的外國人士，如何書寫參訪日本佛寺的經驗，如何描述親眼所見的實存文物，實可提供我們探討佛寺文物於近現代文化中意義轉型的觀察視角，但此方面的研究尚未受學界充分關注。

明治時代，西方人與日本佛教文物的接觸事件，並非全然受忽視。其中，尤以 1880 年代費諾羅沙（Ernest Francesco Fenollosa, 1853-1908，又譯為芬諾洛薩）「發現」法隆寺夢殿觀音之事，廣受矚目，歷百年而關注度未衰。1884 年，美國人費諾羅沙與岡倉天心（1863-1913）以日本官方文物調查員的立場，不顧寺方強烈反對，堅持要求法隆寺打開傳統上作為秘佛之所的夢殿，使得一尊七世紀的漆金觀音像公諸於世，增進了我們對於千年前歷史文化的理解。⁵ 此事，百餘年之後的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東西方的藝術史學者，如辻惟雄、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皆曾於書中提及。⁶ 甚至連非藝術史學界的學者，如東京大學教授齋藤希

³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古川弘文館，1999）；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語る現在、語られる過去：日本の美術史学 100 年》（東京：平凡社，1999）；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日本における美術史学の成立と展開》（東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01）。

⁴ 佐藤道信，《「日本美術」誕生——近代日本の「ことば」と戦略》（東京：講談社，1996）；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東京：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2001）；北澤憲昭、佐藤道信、森仁史編，《美術の日本近現代史——制度、言説、造型》（東京：東京美術，2014）。

⁵ 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1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2), pp. 50-51.

⁶ 費諾羅沙將法隆寺夢殿的「救世觀音」像公諸於世之事，學者經常提及。如：辻惟雄，《日本美術の歴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頁 46。參見：Michael Sullivan,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史、小島毅，也分別於其著作中，提到這則據傳兩百年未曾開扉，而於新的時代中被開啟的夢殿事件。⁷

由於夢殿觀音事件受到不同領域之學者關注，也被書寫於通史類的書籍中，多少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費諾羅沙於其著作中，提到當時法隆寺僧侶，表示此不敬之事將會引起地震，不免給予讀者一種當時僧人迷信守舊的印象。⁸ 部分讀者可能誤以為明治時代之日本寺院，普遍上有封閉的心態，不願與外國人打交道，甚至易與外國人起衝突。這事件也易使人誤解，當時之佛寺，對於寺中佛像、繪畫等，轉為現代意義下文物之潮流，多半處於被動，甚至是被迫的角色。其實，這個例子，呈現信仰者與非信仰者間的極大衝突，並非明治時代日本寺方與不同文化圈人員互動的典型。夢殿觀音（【圖一】）原是一尊秘佛，而秘佛在日本歷來的傳統中，本就有不公開的性質，法隆寺寺方未必是針對外國觀者，或是官方調查人員而產生抗拒。⁹ 此外，多數秘佛仍有定期開扉之日，僅有少數如夢殿觀音般，長年不可得見。若欲得知明治時代京都、奈良諸多古寺，與非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目的的參訪者之間如何互動，實需以其他例子來探討。而西方人旅行記中參訪諸多古寺的書寫，則提供我們觀察多樣互動實況的資料。

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19-129; 蘇利文 (Michael Sullivan) 著，趙瀟譯，《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133-143。

⁷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做為象徵的漢字—費諾羅沙與東洋〉，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圖》（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20），頁 350-367，夢殿開扉之事：頁 353；小島毅著，郭清華譯，《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71-172。

⁸ 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1, pp. 50-51.

⁹ 關於秘佛，參見：Fabio Rambelli, "Secret Buddhas: The Limits of Buddhist Representatio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57, No. 3, 2002, pp. 271-307.



【圖一】夢殿觀音

資料來源：高橋建編集，《週刊ニッポンの国宝 100》07 號 法隆寺救世觀音／雪松図屏風（東京：小学館，2017），頁 4。

西方人士於明治時代的日本旅行遊記中，不乏探訪佛寺的實際經驗，但與此相關的研究卻不多。研究不多的可能原因是，這些遊記中有關佛寺的紀錄僅是旅程中的一部分，每個書寫之例單一看來，似乎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近年有研究者以 1880 年代出版的英文旅行手冊，探索西方人士參訪日本古寺的議題。¹⁰ 不過，早在英文版的日本旅行手冊出現之前，已有多位身分背景不同的西方旅人寫下或繁或簡的旅行誌，仍缺乏學者關注。筆者認為，這些 1870 年代的書寫，比起明治中晚期之後的旅行遊記，更能呈現出東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初始階段，異文化圈人士如何萌發對佛

¹⁰ 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藝術學研究》，第 27 期（2020），頁 1-42；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 1880 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為中心的考察〉，《新史學》，第 31 卷第 1 期（2020），頁 103-147。日本旅行手冊指：Ernest Mason Satow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Being a Guide to Tōkiō, Kiōto, Ōzaka, Hakodate, Nagasaki, and Other Citi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Main Island; Ascents of the Principal Mountains; Descriptions of Temples; and Historical Notes and Legends* (London: John Murray, Yokohama: Kelly & Co.; Shanghai &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84).

寺場域與相關物件的興趣。研究過程中，筆者並無發現本文處理的任一旅行紀錄，造成直接的政策或社會影響，亦無如費諾羅沙的著名事蹟般，扭轉了某一佛寺物件的定位。然而，這些在內容詳盡的日本旅行手冊尚未刊行，日本官方文物保護制度尚未成形，甚至是美術史、文化史皆尚未系統編纂之前，便已寫出的寺院參訪記錄，正足以讓我們觀察具悠久歷史的京都佛寺與其文物，於現代社會中意義轉化的最初歷程。

本文將以四位 1870 年代旅行於日本的西方人士之書寫，即四種文本，作為主要研究材料。這四位旅人分別為奧地利前外交官胡伯納（Joseph Alexander Hübner，又稱 M. Le Baron de Hübner，1811-1892）、法國商人與文化界人士杜黑，又譯為杜雷（Théodore Duret，1838-1927）、英國設計師卓瑟（Christopher Dresser，1834-1904），與英國海軍建築師瑞德（Edward James Reed，1830-1906）。他們所寫的書籍，皆於旅行後數年內出版，出版年份分布於 1870 年代初至 1880 年代初。這些旅行者前往日本的原因迥異，但旅程皆包括京都，且參訪了少則數所，多至十餘所的佛寺。他們在日本其他地點亦可能有探訪佛寺的經驗，但京都地區的旅程與佛寺關聯性最大。聚焦於書寫京都寺院的段落，便於集中觀察與比較。另有一位著名的西方旅行者，即法國收藏家居美（Emile Guimet，1836-1918），同樣於 1870 年代造訪日本，也曾駐足京都。不過，他出版的遊記僅包括日本部分地區，其中並無京都。然而，由於居美以對佛教文化有興趣聞名於世，也留下一些與京都佛寺相關的資料，因此本文也將予以簡要討論。以下小節將以時間先後為序，首先討論 1871 至 1872 的旅行實例，接下來為 1876 至 1877 年，以及 1879 年的例子。最後一節作綜合討論。由於各文本的書寫繁簡不同，筆者將依材料的性質作篇幅調整，但觀察的重點，皆包括旅程的概況、於京都地區參訪寺院的多寡、旅人與日本人士的互動歷程、西方旅人對於佛寺文物關注的面向。以年代前後數例作比較，可以發現在 1870 年代初期到後期，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西方旅人與日本人士的交流深度提升。離 1868 年明治維新的政治變動僅十年左右的時間，在京都旅行的異文化人士，便有深刻認知佛寺文物與文化的可能。

在此需要說明，筆者所謂的交流深度，並非必然指涉形而上的面向，如物件的宗教或哲學上的內涵，而是有多方面的可能。此外，深刻認知一語，乃指前後比對

的相對性而言，而非以今日學術界之認知深度作為標準。當旅者由泛論寺院氛圍，到有興趣觀察寺院內部的細節；由過程中無人可解答旅人的疑問，到寺方人員有意願積極對話，便呈現交流深度的提升。此外，在提及旅人參訪的佛寺時，筆者將會註明該寺是否為今日的世界文化遺產。1994 年，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Historic Monuments of Ancient Kyoto）為題，獲聯合國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稱的十七項場址中，有十三項為佛寺。¹¹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旅行記，與二十世紀後期的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並無直接關係。然而，可供我們思索的是，經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在真實性及傑出的普世價值上皆已受到檢驗。十九世紀後半，明確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但西方旅人已經有機會親自參訪這樣的寺院，觸目所及為具有真實歷史價值的物件，他們是否已經受到吸引，開始關注這些文物的歷史、文化或審美面向？陪同的日方人士，又提供什麼性質的介紹？京都寺院由十九世紀後期至今日，於近現代社會中意義轉化的完整過程，遠非本文篇幅所能處理，筆者僅望聚焦於時代轉變初期，文物被異文化圈人士閱覽並產生新意義的初始階段。

貳、1870 年代初旅行紀錄中的京都佛寺

在具體探索 1870 年代京都旅行實例與書寫之前，有必要由日本的時代變化，以及世界旅行興起兩方面，簡述相關的時代背景。在日本方面，眾所周知，1853 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艦隊至日本，要求幕府開國，成功地於次年訂定條約，開啟日本與西方各國往來的新紀元。而 1868 年明治維新，日本政治開啟新局，與西方國家的交往更加積極。西方商人與外交官於江戶幕府末期、明治年間陸續進入日本，亦有部分外國人士受日本官方或教育機構聘任而來。雖然並非毫無限制，但相對於江戶鎖國時期的嚴格規範，外國人士能於

¹¹ UNESCO, “Historic Monuments of Ancient Kyoto (Kyoto, Uji and Otsu Cities),” http://whc.unesco.org/pg.cfm?CID=31&ID_SITE=688&l=EN (accessed July 13, 2020). 並可參考：朱月華等編，《世界遺產全書》（臺北：墨刻出版，2018），頁 389。十七項包括：賀茂別雷神社（上賀茂神社）、賀茂御祖神社（下鴨神社）、教王護國寺（東寺）、清水寺、延曆寺、醍醐寺、仁和寺、平等院、宇治上神社、高山寺、西芳寺、天龍寺、鹿苑寺（金閣寺）、慈照寺（銀閣寺）、龍安寺、西本願寺、二条城。除了三所神社及二条城之外，皆為佛寺。

日本活動範圍較廣。特別是 1874 年後，向日本官方申請的手續更為明確，旅行的可能性與範圍大為增加。¹² 除了這些因公務或商務長期居留日本的西方人士之外，1870 年代起，亦有專程至日本旅行的西方人士。他們之中有些人是因特定的任務訪日，有些則是在世界之旅，或亞洲之旅的宏大旅行計畫之中，將日本列為一站。世界之旅的新風氣，值得注意。歐亞之間旅行可能性的增加，並非僅受日本局勢本身變化的影響，也與 1869 年末蘇伊士運河開通，遠程交通時間大為縮短有關。跨洲旅行風潮漸興，長途跋涉的旅者不僅是出於公務或商務的原因，也有些是以旅行本身為目的，這也使得與旅行有關的書寫更加盛行。¹³

1871 年，有兩個著名訪日案例，旅行者分別於當年 7 月與 10 月抵達，皆於日本遊歷數月。第一例是奧地利前外交官胡伯納的世界之旅。胡伯納於 1867 年自外交工作退休，1871 年展開世界之旅，並於 1873 年出版了《走遍世界各地，1871》(*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一書之法文版。¹⁴ 翌年，何柏特(Mary Elizabeth Herbert, 1822-1911)女士將此書譯為英文出版(*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此書之英文及法文版，皆曾再版，可見頗受讀者歡迎。¹⁵ 第二例則是兩位歐洲人士於 1871 年冬天抵達日本，為法國人杜黑，與居於法國的義大利人賽努奇(Henri Cernuschi, 1821-1896)。兩人的旅程以亞洲地區為主，長達一年多，於 1873 年初回到歐洲。¹⁶ 旅程結束後，杜黑出版了遊記，之後也因收集大量日本繪本而聞名。賽努奇則建立了頗為著名的亞洲文物收藏，後成為賽努奇博物館(Cernuschi Museum)。¹⁷

首先探索退休外交官胡伯納之例。胡伯納於 1871 年 7 月底抵達橫濱，旅行

¹² 丸山宏，〈近代ツーリズムの黎明：「内地旅行」をめくって〉，吉田光邦編，《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変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 89-112。

¹³ Andrew Elliot, "British Travel Writing and the Japanese Interior, 1854-99," in Martin Farr and Xavier Guégan, eds., *The British Abroad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97-216.

¹⁴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 (Paris: Hachette, 1873).

¹⁵ 本文參考英文版本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9). 筆者目前收集到的版本包括：1873 年、1877 年法文版、1874 年、1879 年英文版。

¹⁶ 張育晴，〈十九世紀末法國人對日本繪本的詮釋——以 Théodore Duret 的著作為例〉（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0），頁 16-29。

¹⁷ 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www.cernuschi.paris.fr/en>），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至 9 月底，旅程約十週。他停留在東日本的時間較長，但亦至大阪、京都等地，由神戶離開日本。他曾與日本高官岩倉具視（1825-1883）會面，岩倉即是 1871 年底帶領大批高官出訪歐美近兩年的使節團團長。¹⁸ 由此可見，胡伯納雖無公務身分，但也因有顯赫經歷而受日本官方接待與協助。他在京都的時間僅有 9 月 22 至 25 日數日。¹⁹ 旅行遊記中記有與一位英國駐日外交人員恩斯里（Mr. Ensle, ? - ?）²⁰ 同行，9 月 22 日從大阪出發，由淀川水路抵京都南邊的伏見地區，再以騎馬兼步行方式進入京都，沿途皆有地方政府派員協助。

胡伯納一行於 22 日傍晚參訪了稻荷神社、東福寺。第二天（23 日），參觀京都御所、二条城、北野天神神社、金閣寺。第三天（24 日），參觀西本願寺、祇園地區、知恩院。25 日由琵琶湖方向離開京都。胡伯納表示，旅途間還看了其他寺院，但不一一記錄。他多次強調京都的寺院數目極多，文中指出，23 日一大早，京都府大參事（明治時代的地方官，職位相當於副知事，即副首長）便帶了一張長達 6 或 8 英尺的紙，上面標出了許多建議參訪的寺院。同行的恩斯里先生費了不少工夫，才說服他減少一些參訪名單。由這個簡短的記述，可知京都地方官員頗為積極安排外國訪者參觀佛寺。明治初期京都地方官民歡迎外國訪者的背景，將於後文繼續討論。遊記另一段落，胡伯納提到京都的佛寺有三千所之多。²¹ 雖然三千是個概略的說法，也透露出作者知曉佛寺是此地特色之一。

胡伯納於遊記中明確提及寺名的幾個寺院，包括東福寺、金閣寺、西本願寺和知恩院（請參見文末附表），書中描述繁簡不一。²² 他簡要地提到東福寺的橋，橫亙一滿布楓樹的溪谷，可知景觀優美似乎是讓他印象深刻之處。而書中與金閣寺有關的篇幅稍多，且提及金閣相當美麗，年代約於 1420 年，早於「太閤」（豐

¹⁸ 岩倉使節團，1871 年 12 月 23 日出發，1873 年 9 月 13 日回到日本。使節團共 107 人，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著名人物。

¹⁹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p. 347-367.

²⁰ 可能是指 James Joseph Ensle，英國駐日領事之一，Wikipedia, "British Japan Consular Servi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Japan_Consular_Service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0).

²¹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p. 349, 364.

²² 東福寺、金閣寺、知恩院、西本願寺，參見：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p. 349, 360, 365-366, 361-363.

臣秀吉，1537-1598）的時代。不過，此節並未對建物本身的外觀細節多著墨。²³ 作者盛讚此處之庭園是日本庭園之最，樹木造型奇特。接著，筆鋒一轉，寫著，他覺得附近小丘應該可眺望美麗景觀，因此不顧陪同的日本人員阻攔，執意登上小丘，還引起了一陣緊張。²⁴ 由胡伯納的寫作方式，可知他的遊記並非以詳實記錄景點或史蹟資料為最主要考量，而是夾雜著描述個人有趣的經歷。另需補充的是，由年代相近的資料，可知明治初年時金閣的金箔剝落殆盡，並不顯得輝煌耀眼。²⁵ 或許因為這個緣故，胡伯納雖感受金閣之美，卻沒有受到強烈的吸引。

除了有趣的經歷，胡伯納也關注發生於某些地點的著名事件。與知恩院有關的段落，胡伯納的書寫幾乎不在寺院本身，而是非常仔細地敘述了 1869 年 3 月 23 日英國使節巴夏禮（Harry Parkes，1828-1885）在附近遇刺之事。²⁶ 對作者個人，或是他所設想的西方讀者來說，這件發生於兩年前的事件，生動地反映了由江戶到明治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變動，似乎更值得書寫。

《走遍世界各地，1871》書中所記的京都寺院，唯一詳細描寫的僅有西本願寺。胡伯納清楚地寫出西本願寺兩個主要堂宇，一供奉親鸞上人（1173-1263），一供奉阿彌陀佛。對於建物的尺寸、大致構造、裝飾細節等皆有著墨。他形容建物的裝飾風格，有如「佛羅倫斯的哥德式教堂」（the Gothic churches of Florence）。²⁷ 文中一一指出堂內佛壇使用的黑色漆器、鍍金裝飾、銅製器物、華麗絲織品等，並提及佛龕上裝飾著金地為底的繪畫。堂內在四個由屋頂垂吊而下的燈具照射下，交融著外面照射進來的日光，顯得極為壯麗。又補充說明，於京都建物可見的華麗誇飾（baroque）風格，多與豐臣秀吉及其繼承者有關。這段記述值得我

²³ 依現有研究，金閣於應永五年（1398）竣工，但現存建物為 1950 年燒毀之後再建，參見：福田敏朗，〈圖版說明：金閣〉，山根有三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2：京の五山》（東京：集英社，1983），頁 142。有關金閣寺整體介紹，參見：有馬賴底、梅原猛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21 金閣寺》（京都：淡交社，2008）。

²⁴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p. 360-361.

²⁵ Ernest Mason Satow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pp. 356-357. 明治年間金閣之照片，參見：小路田泰直監修，《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復刻日本農商務省 1901 年刊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頁 156、157 間插入之圖版。原書無編者名，但有明治 32 年（1899）帝國博物館總長男爵九鬼隆一（1852-1931）序。

²⁶ 有關此事件可參看：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著，譚媛媛譯，《明治維新親歷記》（上海：文匯出版社，2017），頁 349-353；Gordon Daniels, *Sir Harry Parke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1865-1883*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Ltd, 1996), pp. 82-83.

²⁷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 362.

們重視的是，胡伯納對於部分寺院確實仔細觀看，尤其對建物裝飾與內部的器物頗感興趣。雖然他仍然不脫異國觀者的眼光，比喻西本願寺如佛羅倫斯的教堂，但這是一個讓讀者嚮往的讚詞，而非僅強調東方寺院的新奇或怪異。此外，他一一辨識佛壇內的漆器、銅器、織品等，也讓西本願寺內陳設的意象更加具體，非停留在模糊的想像。文中提及堂宇供奉的親鸞上人、阿彌陀佛等，表示作者對寺院的宗教內容，即使不是透徹的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知曉。

《走遍世界各地，1871》一書的書寫風格，並不在於全然詳實紀錄所訪之地的客觀存在，而是夾雜個人的有趣經歷，並收入曾經發生的吸引人事件（如英國使節被刺）。即使如此，我們仍可見胡伯納對於京都的古寺有某種程度的理解。由書中文字，可知他對京都的諸多寺院分屬佛教的不同宗派，創立於不同年代等歷史背景，大致能掌握。此外，在部分例子上，他提供了眼見為憑的實景細節，不同於歷史或宗教書籍的文字記述。比如，他對西本願寺內部布置便有較詳細的描述。若以今日美術史學科的分類而言，胡伯納對於與寺院相關作品的關注，多集中在建築物的雕飾與工藝美術品上，對於寺院內可能見到的雕像與繪畫並無評價。在西本願寺的章節中，他提到金地為底的繪畫，但對於繪畫的內容、主題或風格，胡伯納似乎並無認識。同樣地，他也沒有提到京都寺院的佛像雕刻。可以推測，並非他沒有看到佛像，而是他還未將佛像當成可以欣賞的對象，遑論是給予正面或負面評價。

由另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推測，此時無論是日本官方陪同人員，或寺方人士，尚未找到合適的方式，與外國觀者深入的交流。胡伯納寫著：「雖然對這些寺院感興趣，但也很快就感到厭倦。心中有成堆的問題，但無人可以解答。」²⁸ 即使有京都地方政府派出的嚮導陪同，他們似乎無法提供更多的說明，讓外國觀者獲得進一步的認知。

除了參訪寺院的經歷之外，胡伯納之書對於京都市區的蕭條，及佛寺於明治初期的經濟困境，留下頗有價值的紀錄。他寫著，根據大略的統計，在遷都東京

²⁸ 原文：“In spite of the interest attaching to these temples, one very soon tires of them. Heaps of questions present themselves to one’s mind, but no one can answer them.”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 364.

之前，京都有四十萬人口，遷都後僅餘二十萬。胡伯納書中並未明白註釋，但我們由其他資料得知，1869年（明治二年）天皇遷往東京，並有大量人口隨之遷徙，京都確實遭遇巨大變化。²⁹ 1871年到訪的胡伯納觀察到，京都市區內除了少數街道，大部分地方都顯得冷清。他也寫著，寺院在過去可由龐大的領地，或由主政者發放的俸祿獲得豐厚的資源，但明治維新之後則面臨巨大危機。綜觀胡伯納的書寫，在呈現京都寺院窘境的同时，也忠實地反映了當時地方政府有意盡心協助特殊的外國人士參觀寺院。書中還有一段提到，有些京都寺院由於經濟困難，將部分建物改為賓客住宿之所。³⁰ 文中並無清楚說明，外國旅人是否也可投宿於歷史悠久的古寺之中，但後文筆者將舉出西方人士宿於古寺的實例。可合理推測的是，胡伯納提及京都寺院於明治初期面臨重大的經濟難題，或有可能引發寺方意識到需要開放接待更多旅人。然因本文篇幅所限，此點將留待未來再深入探索。

胡伯納《走遍世界各地，1871》之英譯本發行之後，有數則書評予以推介。書評雖對書中的各部分有不同評價，但一致讚美胡伯納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者，不但提供了頗有見地的內容，也有些段落寫得相當有趣，值得閱讀。³¹ 就本文關注的焦點——即日本寺院文物轉為現代意義下的文化遺產之早期發展歷程——而言：可知，早在明治初年，部分京都寺院，便以美麗的庭園、傳統的建物、華麗的工藝品，吸引外國訪客的目光。胡伯納的書寫，呈現旅人的實地觀察，也對京都佛寺的傳統與歷史，提供某種程度的資訊。這些認知，雖然不夠深刻，但比起西方人透過博覽會或貿易輸出可見到的版畫或工藝品，具有不同的歷史向度。

稍晚於胡伯納，另有兩位歐洲人士於1871年冬天抵達日本。杜黑與賽努奇，進行為期一年多的亞洲之旅，始於1871年9月，結束於1873年1月，途經日本、中國、蒙古、爪哇、錫蘭、印度。歸國後，杜黑於1874年出版了《亞洲之旅：日本、中國、蒙古、爪哇、錫蘭、印度》（*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²⁹ 參見：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明治二年の東京遷都》（東京：講談社，2001），全書，特別是頁167-168；脇田修、脇田晴子，《物語京都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頁286-295。

³⁰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p. 363.

³¹ Anon., "New Book: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ember 21, 1874; Edward Duffield Jones, "Book Review: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The Academy*, Vol. 6, Iss. 133, Nov 21, 1874, pp. 578-579.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一書。³² 杜黑與賽努奇均具有多種身分，在政治、商業、藝術收藏與批評場域上活躍。兩人皆對亞洲作品極感興趣，但此次亞洲之旅契機與避開法國政壇的紛亂也有關聯，詳見其他學者討論。³³

杜黑與賽努奇抵達日本橫濱時為 1871 年 10 月，次年 1 月於關西一帶旅行後，搭船至上海。《亞洲之旅》整本書的篇幅較短，對於旅程所見，不如胡伯納描述詳細。書中，杜黑提到京都以寺院聞名，也盛讚京都寺院的美麗。不過，較多的篇幅，用於描述寺院周圍的環境或是庭園的優美，也強調由寺院所在地眺望的景觀。他認為，日本人到寺院並不僅是為了祈禱，也同時為了來到一個美麗的地方。寺院中會舉辦茶會或祭典，增加人們生活的樂趣。他特別讚美的寺院是金閣寺，稱此處為「我們想像不出比這裡更宜人的地方」。³⁴ 文中描述重點在於庭園和周邊的風光，而非金閣建築本身。在建物與雕像方面，杜黑則曾提及西本願寺（*Nichi-hon-gouan-dgi*）和三十三間堂（*San-djou-san ken-do*）。他稱西本願寺是「日本最大的寺院」，且其美麗宏偉，稱得上是偉大的建築。他又稱三十三間堂是京都最古老的建築之一，有三十三千三百三十三個大大小小的佛像。³⁵ 此外，他也提到知恩院與妙法院之名。³⁶

杜黑本人的興趣在於浮世繪，他是最早給予葛飾北齋（1760-1849）高度評價的藝評家之一。³⁷ 除了精美的單張版畫，他還收藏了數以千計的繪本，是十九世紀後期東西藝術交流的重要推手。³⁸ 不過，杜黑對佛教繪畫並沒有顯露興趣。在京都的寺院中，特別是西本願寺，應該很有可能看到障壁畫，但書中並無紀錄。書中稱此

³²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4). 與京都有關的內容參見：pp. 39-56.

³³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Vol. 25, No. 1, 2002, pp. 17-34; 張育晴，〈十九世紀末法國人對日本繪本的詮釋——以 Théodore Duret 的著作為例〉，頁 11-12。

³⁴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 53.

³⁵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 51.

³⁶ 文中還提及 Mi-hô-in 有巨大的木造佛頭，Tchi-hô-in 有一個大鐘，其他地方也有青銅佛像，以及各種奇特的事物，但皆僅簡要提及。當時拼音尚未標準化，筆者推測 Mi-hô-in、Tchi-hô-in 或許指妙法院、知恩院，但尚未能確定，先記於此，就教於大方。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 52.

³⁷ Shigemi Inaga, "The Making of Hokusai's Repu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Japonisme," *Japan Review*, No. 15, 2003, pp. 77-100.

³⁸ 張育晴，〈十九世紀末法國人對日本繪本的詮釋——以 Théodore Duret 的著作為例〉，頁 30-37。

寺為「日本最大的寺院」，³⁹似乎是泛論的說法，並沒有對其明確規模有所討論。另外，他對於三十三間堂也僅是泛論，雖然所見佛像甚多，對寺中佛像的特點，並無明確評價。書中寫著三十三間堂有「三十三千三百三十三個佛像」，應該是當地流行的一種說法。杜黑並沒有對於此數字的合理性加以探討，但在數年後其他西方旅人紀錄中，則有所討論，顯示出對傳聞更為嚴謹的態度，詳見後文。

綜觀胡伯納與杜黑的書寫，可知早在 1871、1872 年，即明治維新後不久，京都便有數個寺院願意讓外國人參觀，其中包括今日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金閣寺和西本願寺，還有寺中佛像現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的三十三間堂。這兩位西方作者，對於寺院的庭園與周圍的自然環境多所讚美，也對寺院建築及堂內的工藝裝飾給與審美上的好評。然而，他們並沒有對京都寺院中的繪畫或雕像留下深刻印象，遑論給予美感方面的評價。

參、1876 至 1877 年居美、卓瑟的旅行

1876 年，有兩位著名歐洲人分別前往日本旅行數月，他們關注的角度，比起胡伯納和杜黑豐富許多。這固與旅行者個人特質與興趣有關，但由他們所記的活動歷程，也可看到由 1871 到 1876 短短五年之間，日本內部已有不少變化，出現了許多可與外國旅人進行相對深度交流的本地人士。西方觀者觀看角度的擴增與日本人士協助程度的提升，形成了足以讓西方讀者理解的豐富書寫內容。

1876 年 8 月、12 月，法國收藏家居美、英國設計師卓瑟分別到亞洲旅行，且行程都包括日本京都。兩人行程有不少共通點，他們都是先到美國費城參加當年的世界博覽會後，再由美國西岸的舊金山搭船前往橫濱。相關資料分述如下。

著名的法國收藏家居美，以對佛教美術有高度興趣聞名，雖然他的日本行程曾到京都，卻沒有留下於京都地區的遊記，因此以下將以其他資料簡要探索。居美 1876

³⁹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 51.

年的亞洲之旅，與畫家何加美（Félix Régamey, 1844-1907）同行。⁴⁰ 他們由舊金山搭船橫越太平洋，8 月 26 日抵達橫濱，接著前往東京，曾於鎌倉、日光等關東地區旅行。10 月 3 日啟程，以人力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沿著江戶時代地方武士旅行的傳統路線，東海道，向京都前行，16 日抵達。在京都地區遊歷後，11 月初由神戶搭船前往上海。居美於 1878、1880 年先後出版了日本遊記兩冊，並於文中透露日後仍有繼續書寫的計畫。⁴¹ 可惜後續出版計畫並未實現，現有的兩冊遊記中並沒有包括京都的行程，以致今日研究者無法由親筆遊記詳知他個人的觀察或感受。

學者依現存的其他資料，大致勾畫出居美在京都的足跡。他經過近郊的石山寺、園城寺，抵達京都市。大約兩周的停留期間內，去過的寺院至少包括東寺、西本願寺、東本願寺、建仁寺。⁴² 居美帶回歐洲的物件中，包括東寺講堂佛像的複製，由京都佛師山本茂助製作。另有由同行畫家何加美繪製的作品，描繪西本願寺飛雲閣、東本願寺的剃髮式，以及一幅畫出建仁寺法堂內僧侶集會的情景。⁴³ 由此可見他對於佛像、建物、宗教儀式等皆感到興趣。

值得一提的是，居美與積極推動日本博物館事業的日本高官九鬼隆一（1852-1931）頗有交情。學者認為兩人很可能在 1873 年，九鬼訪問歐洲時就認識。1876 年，居美在東京時，以及 1878 年，九鬼至巴黎參加萬國博覽會時，兩人都有交流。除此之外，居美訪日時擔任翻譯的幾位年輕日本人，後來得到留學法國的機會，歸國之後，有人投入京都織品（西陣織）的改革，也有人進入日本文部省，並參與博物館事業推動。⁴⁴ 由於本文研究方向，是要由西方人本身的書寫來觀察他們對於京都佛寺相關文物的認知，因此有關居美的資料簡述到此。

1876 年底抵達日本的，是英國設計師卓瑟。透過他自己親自書寫的旅行紀錄，

⁴⁰ 有關居美之旅行，參見：Ting Chang, *Travel, Collecting, and Museums of Asian Art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3), pp. 73-110.

⁴¹ Émile Guimet, *Promenades Japonaises* (Paris: G. Charpentier, 1878); Émile Guimet, *Promenades Japonaises: Tokio, Nikko* (Paris: G. Charpentier, 1880).

⁴² 尾本圭子，〈解說〉，エミール・ギメ（Émile Guimet）著，岡村嘉子譯，《明治日本散策：東京、日光》（東京：Kadokawa，2019），頁 365-419，旅程資料參見：頁 384-385。尾本特別提到居美雖對佛教文化頗有興趣，卻沒有到奈良。尾本並無對此加以解釋。

⁴³ 尾本圭子，〈解說〉，頁 365-419，特別是頁 399-400。

⁴⁴ 尾本圭子，〈解說〉，頁 365-419，特別是頁 401-403。

可清楚許多細節。卓瑟赴日有多重任務，他一方面代表英國博物館致贈日本工藝作品，另一方面又受日本政府之託，於日本各地考察工藝品製造，給予日本建議。除了隨行的日本人沿途記下意見，完成官方報告書之外，卓瑟本人也另外書寫了旅遊見聞以及對日本建築與工藝的看法，以《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為題，1882 年同時於倫敦和紐約出版。⁴⁵ 此書之書名雖非遊記，但約有一半的篇幅，寫作方式與遊記相近，依旅程順序記下所見所聞。書的後半則是依品類，討論各種日本工藝。另外，須註明的是，書名中雖有「art」一詞，但檢視此書，書寫的內容主要是陶瓷、金屬器、織品等，並無章節專門探討繪畫或雕像等品類。

卓瑟日本之旅的特殊性需要加以說明。⁴⁶ 此人與日本工藝的明確關聯，始於 1862 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他獲得負責日本展件的英國外交官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之允許，繪製展件簡圖。⁴⁷ 自此，便對日本的工藝設計密切關注。除了日本工藝之外，卓瑟也對西方及非西方世界的工藝設計頗有研究。⁴⁸ 1873 年的維也納博覽會，日本積極參展。然而，會後，返日船隻卻遭逢海難，船上之日本作品與另購的他國作品因此損失頗大。⁴⁹ 知曉此事件後，英國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⁵⁰ 決定收集歐洲工藝品贈送日本，由卓瑟執行致贈之舉。⁵¹ 1876 年，卓瑟帶著致贈品，先至美國參觀費城博覽會，之後又至其他城市演講與拜會，12 月初由舊金山搭船前往橫濱，12 月 26 日抵達。卓瑟不但代表了以推

⁴⁵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⁴⁶ 卓瑟日本之旅的任務及相關背景，謝宜君論文中有詳細的討論，參見：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0），頁 12-18。

⁴⁷ Christopher Dresser, "The Art Manufacturers of Japan,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 Vol. 26, No. 1315, 1878, p. 169. 有關阿禮國協助日本參與 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之事，參見：劉思涵，〈Rutherford Alcock 與日本藝術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1），頁 19-40。

⁴⁸ 有關卓瑟之整體評價，參見：Widar Halén, *Christopher Dresser: A Pioneer of Modern Design*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90).

⁴⁹ 山田陽子，〈サウス・ケンジントン博物館と日本：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運んだ 1876 年の寄贈品選定基準について〉，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14-24；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 155-156。

⁵⁰ 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1899 年改名為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 V and A。

⁵¹ （明治）《英国サウス・ケンシントン博物館長ノ英国及欧州諸国芸術品寄贈ニ関スル報告書：町田博物館局長宛》，1876，早稻田大學中日古籍資料庫（bit.ly/427AkoX），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廣工藝美術聞名的英國機構，且在費城博覽會中，也與日本負責展覽事務的官員們相熟，因此一到日本，就受到官方高度重視。他不但得以面見天皇，備極榮耀，且被賦予實質任務，由日本負擔旅費，讓他到日本各地考察工藝製作。卓瑟不僅與推動博覽會、博物館事業的佐野常民（1823-1902）、町田久成（1838-1897）有交流，且受到內務卿大久保利通（1830-1878）⁵²等日本最高階政治人物的支持。

卓瑟於書中前言中特別提及，他於旅程中獲得極大的便利，得以前往以往西方人無法進入的地點。⁵³ 在此須補充的是，1872 年，日本政府進行了首次古文物調查。因當年干支為壬申，故稱之為「壬申檢查」。此次調查範圍甚廣，京都奈良一帶的古寺文物是重點之一。⁵⁴ 卓瑟 1876 年 12 月至 1877 年 4 月初的旅程，包括關東、關西地區、名古屋、伊勢等地。關西地區行程，便包括了多處壬申檢查調查過的古寺。探討具體行程之前，還需說明一些值得注意之處。卓瑟拜訪日本的 1876 年前後，可見日方已有多位高級官員對於博覽會有強烈的興趣，除了積極籌辦、參與之外，並與西方人士多方交流。過去學界關於博覽會的研究，較多關注於這些國際會事如何促成日本版畫與工藝品在歐美的流行，以及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形象建立。⁵⁵ 然而，因應博覽會而展開的諸多交流活動中，也包括了對古代文物的調查與評價，成為古代文物於現代社會中意義轉化歷程的一環。新興的博覽會活動與古文物於現代被重新評價的關聯性，尚未得到學界充分關注。以此例而言，雖然卓瑟被官方交付的任務，是對日本當代的工藝製作提出建議，但旅程中除了參訪當時的工藝製作場所外，也參觀了數量頗多的古代佛寺，以及東大寺之正倉院。⁵⁶ 可見考察當代工藝製作一事，並沒有被狹義地限縮。雖然作者並沒有在書中明確論及古物保護的議題，但對於寺院物件的詳細紀錄，顯示出卓瑟以新的眼光關注古代品物。

⁵² 大久保利通，當時為第五任內務卿，任期 1874 年 11 月 28 日至 1878 年 5 月 15 日。

⁵³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vi-vii. 卓瑟取得特殊的內陸旅行免狀（通行證），可以在日本各地旅行。參見：佐藤秀彥，〈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の宝物調査〉，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頁 6-13。

⁵⁴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 72-80。相關資料參見 e 國寶網頁：〈壬申檢查關係資料〉，e 國寶（https://emuseum.nich.go.jp/detail?langId=zh&webView=&content_base_id=100815&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⁵⁵ 寺本敬子，〈パリ万国博覧会とジャポニスムの誕生〉（京都：思文閣，2017）；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

⁵⁶ 參見：巫佩蓉，〈明治初期的正倉院文物展示與西方人之報導：古代珍藏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之早期例證〉，《故宮學術季刊》，第 40 卷第 2 期（2022），頁 163-206。

與京都有關的內容，收於《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第六章。⁵⁷ 卓瑟 1877 年初搭船由橫濱往神戶，於神戶、大阪、奈良、京都各地訪查。⁵⁸ 當時，神戶至大阪，與大阪至京都間的鐵路已經開通。依卓瑟所記，大阪至京都約需二小時。⁵⁹ 他對旅行過程依序書寫，但並無一一標示日期。由大阪經伏見地區前往京都時，正值西南戰爭爆發，可知為 2 月上旬。書中記錄著，他被告知薩摩叛亂之事，沿途也看到軍人和警察，但他的參訪行程並無中斷，京都的地方官員也於此期間招待他餐飲與茶會。⁶⁰ 卓瑟於京都期間下榻於圓山地區的中村屋。⁶¹ 由其他資料可知，京都此時已有專門提供外國人住宿的旅館，中村屋即是其一。⁶² 筆者尚未掌握資料可確認一年約有多少西方人造訪京都，但由存有專門旅館這一點看來，可知西方旅人並非極為罕見。⁶³ 卓瑟書中所記，造訪的寺院包括清水寺、西大谷、三十三間堂、西本願寺、東寺、知恩院、東福寺，以及郊區的萬福寺、鳳凰堂（平等院）。除了寺院之外，卓瑟還參觀工藝品製造場所與商店，後由琵琶湖方向離開。就參觀的寺院數量而言，比 1871 年旅人所記多了不少。其中，清水寺、西本願寺、東寺、平等院，今日皆屬世界文化遺產。

就寫作特色而言，上節討論胡伯納的旅行誌雖然也曾讚美寺院雕飾之精美，但卓瑟的書寫，則更顯細膩的觀察。他的書寫，涵括了對建築結構整體的評價，以及對建物的裝飾細節的用心。比如，書中提到東寺之塔是日本最大的，然而此塔比例雖好，卻缺乏豐富的雕飾細節。⁶⁴ 他對知恩院則讚譽有佳，指出建築的結構壯麗（magnificent），且由當時最著名木匠所建。書中還提到，他於參觀時被指引看到屋

⁵⁷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141-160.

⁵⁸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 65.

⁵⁹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120. 另依數年後出版的日本旅行手冊，大阪至京都的鐵路旅程，需時一小時二十九分至一小時五十分，參見：Ernest Mason Satow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p. 349.

⁶⁰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137, 157-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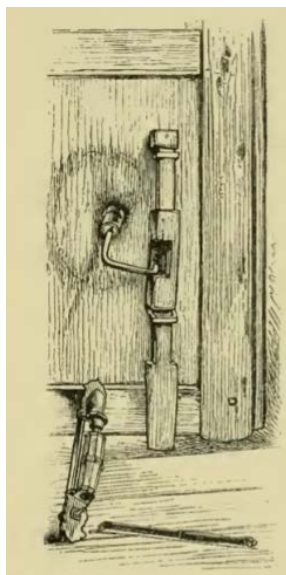
⁶¹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 140.

⁶² 位於祇園地區的中村屋，是明治時期供外國人住宿的旅館之一，參見：京都ホテルグループ（https://www.kyotohotel.co.jp/history/chapter_01/chapter_01_02/），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⁶³ 1884 年出版以英文書寫的《日本旅行手冊》中，列出更多可供外國人選擇的京都地區旅館與餐館，參見巫佩蓉討論。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頁 5。

⁶⁴ 東寺五重塔為日本最高的五重塔，高約 55 公尺，建於 1644 年，現被指定為國寶。參見東寺官網（<https://toji.or.jp/guide/gojunoto/>），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此段提及的寺院，參見：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141-150.

頂下有著名木匠刻意留下的傘。⁶⁵ 文中也提及，知恩院之鐘是日本最大的，口徑達九又二分之一英呎。⁶⁶ 此外，當提到東福寺有屋頂的橋時，作者想到琉森（Lucerne）也有一些類似的橋樑。⁶⁷ 卓瑟最有興趣的面向，是建築物與裝飾工藝。他的書寫，顯示對佛像本身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確實於文中多處提及寺院中供奉的佛像，卻皆以「大佛」（Dai-butz）稱之，並不在意尊像的確切名稱，連尊像是佛像或菩薩像也沒有區分，遑論寫下其他評價。其中一個有趣的對比，出自與平等院鳳凰堂有關的小節。⁶⁸ 文中對此寺院的建築與裝飾細節評價頗高，甚至連一個門鎖的構造都費了許多篇幅描寫，還附上插圖（【圖二】）。然而，對於今日被視為日本國寶的鳳凰堂阿彌陀佛像，卻僅用「大佛」（Dai-butz）一語帶過。



【圖二】宇治寺院的門鎖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p.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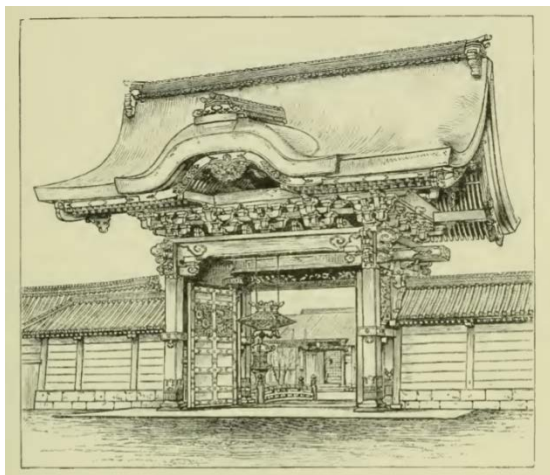
⁶⁵ 傳說木匠左甚五郎將傘放置於御影堂內，有避邪之意，此傳說書於知恩院官網的介紹中：〈知恩院の七不思議〉，知恩院官網（<https://www.chion-in.or.jp/highlight/wonders.php>），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12 日。

⁶⁶ 9.5 英呎約為 2.89 公尺。依知恩院官網，知恩院鐘為重要文化財，高 3.3 公尺，直徑 2.8 公尺，造於 1636 年。參見：〈知恩院の建造物〉，知恩院官網（<https://www.chion-in.or.jp/highlight/building/daishoro.php>），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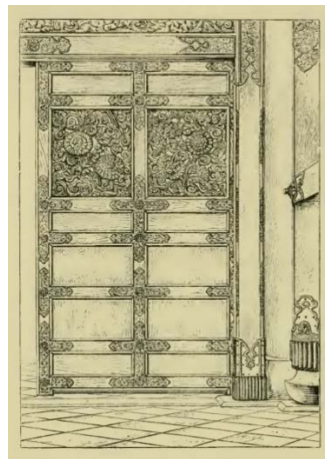
⁶⁷ 卓瑟並沒有註明哪一座橋，琉森的著名景點中，Kapellbrücke（Chapel Bridge）即是一座有屋頂的橋。

⁶⁸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149-150.

《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一書附有 200 餘幅插圖，數量龐大且精美的插圖是此書一大特色。⁶⁹ 除了由文字內容推敲卓瑟的觀點，這些插圖也顯示卓瑟的興趣所在。京都章節中提供最明確細節的，是西本願寺東門：總共以四幅插圖呈現了門的整體形貌以及細節【圖三】至【圖六】。卓瑟提及他在京都期間，雇用了攝影師攝影，也雇用了作裝飾藝術的藝術家來繪圖，以記錄寺院裝飾。⁷⁰ 此外，還有一幅是東福寺建築內部的斗拱和梁柱【圖七】，另一幅是萬福寺屋頂內部【圖八】，同樣也顯示出構造與裝飾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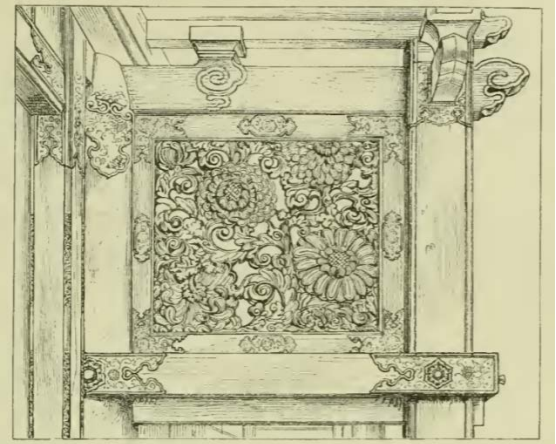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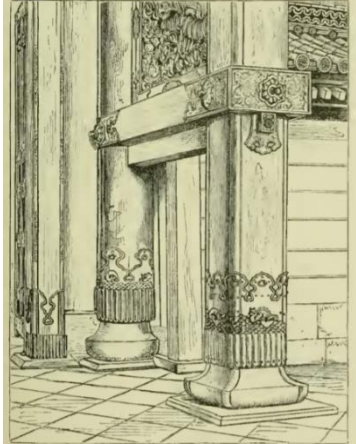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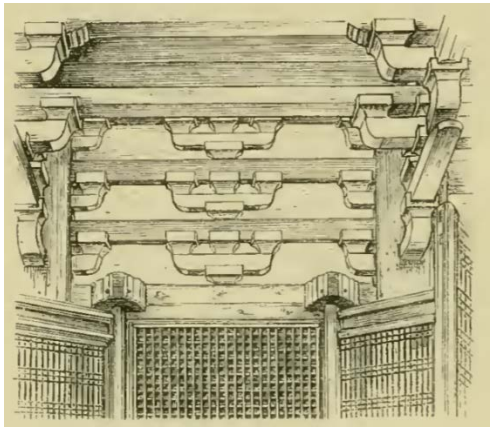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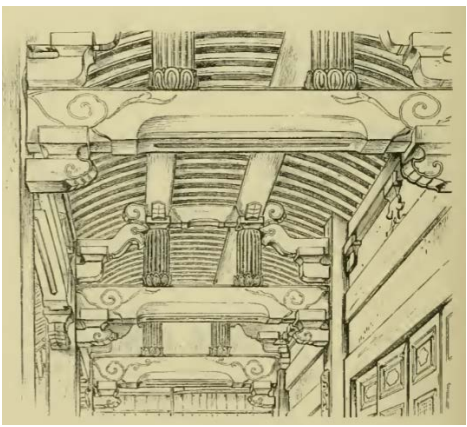
【圖三】西本願寺東門



【圖四】西本願寺東門

⁶⁹ 謝宜君論文對於這些插圖的特點，包括圖版類型，是否來自日本傳統的版畫等，有詳盡的分析。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

⁷⁰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 147。不過，書中之插圖可能並不是直接採用當地畫師所畫，而是另行繪製。因為書中提及當地的畫師對於透視法的運用不熟悉，以致難以用圖繪表達某些建築細節，但書中附圖之建築物細節看來相當合理。

	
<p>【圖五】西本願寺東門</p>	<p>【圖六】西本願寺東門</p>
<p>【圖三】至【圖六】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resser, <i>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i>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pp. 143-145.</p>	
	
<p>【圖七】東福寺建築內部的斗拱和梁柱</p>	<p>【圖八】萬福寺屋頂內部</p>
<p>【圖七】至【圖八】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resser, <i>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i>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p.148.</p>	

當時西方的評論，指出卓瑟的書每一部分都很有價值，特別是建築的章節，尤其因為書中附有插圖，更具無與倫比的價值。⁷¹ 建築與建物上的裝飾工藝，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就西方藝術的位階而言，讚美工藝品，或讚美建築，有不同的意義。卓瑟之前的西方作者，認為日本建物（**building**）多為木造，無法持久，難以稱得上是「建築」（**architecture**），《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一書則給予迥然不同的評價。⁷² 卓瑟指出，木造建築符合日本的自然環境特性，且存世數百年的寺院實例甚多，耐久性遠超西方人的想像。況且，這些木造建築並非僅是功能優異，細膩的裝飾更是值得欣賞。他的書寫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見解，獲得關注。

以建築史的脈絡看來，卓瑟是最早給予日本建築正面評價的西方人之一。而放到本文關注的佛教文物觀看意義轉化上，卓瑟之書提供了一個例證，也就是將古代的佛寺放到建築史的脈絡當中。本文前一節指出，西方人已對京都佛寺表示讚美，但多是對整體環境的欣賞，卓瑟則是清晰地觀察佛寺建物結構及細部裝飾，在在顯示書寫者具備西方建築史與工藝美術史的知識背景。相對地，卓瑟對於佛像的興趣不高，書中少有描述或評價，並無顯示把佛像作為雕塑欣賞的企圖。然而，即使是簡要的書寫，他的紀錄也比之前的著作清楚，表示作者關注當地傳聞是否符合親眼所見的實態，而非僅是隨手一記。比如，前面提及杜黑提過有「三十三千三百三十三尊佛像」的寺院，卓瑟同樣提及此語，但加以說明，三十三間堂之中，等身像（**life-size figures**）僅有一千零一尊，但祥雲、天蓋等附屬物上則有諸多小像。他也提及了堂上的主尊和二十八部眾。⁷³ 雖然他用的詞是「**dai-butz**」（大佛）、「**twenty-eight figures**」（二十八個人物），而非更明確的尊像名稱，但畢竟比 1870 年代初期的遊歷者所記更為清晰。

由《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之內容看來，雖然卓瑟參訪之佛寺數量甚多，但他對於佛教的內涵或其於日本的發展，以及諸佛寺的宗派差異等，似乎不感興趣。有關這一點，我們應該留意，這很可能是作者個人之傾向，而非旅程中導

⁷¹ Widar Halén,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and the Cult of Jap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88), p. 275.

⁷² 有關卓瑟對日本建築的高度評價，參見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頁 40-48。

⁷³ 三十三間堂主尊為千手千眼觀音，壇上佛像位置與名稱，參見：菅原信海、みうらじゅん等著，《新版古寺巡礼京都 18 妙法院、三十三間堂》（京都：淡交社，2008），頁 69。

覽的日本人士，無法提供他相關的訊息。卓瑟書中寫著，在西本願寺，乃由赤松連城（1841-1919）帶領他參觀，除了主要建築，也參觀了花園、茶室。⁷⁴ 赤松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於 1872 年派至英國的僧侶，也是日本第一個赴西方國家留學的僧侶。他留學約兩年返國，對於淨土真宗的寺務改革、教育發展等，有重大貢獻，也對推廣日本佛教至西方世界奠下基礎。⁷⁵ 卓瑟指出赤松的英文相當流利，也知曉他為了因應新時代而被教團派至英國留學之事。他甚至提及指派佛教僧侶至西方國家學習的原因之一，乃是為了考察基督教與歐洲社會的關聯。可以合理推測，赤松應該有能力解釋西本願寺以及日本的宗教特點，但卓瑟書中並無紀錄。回顧 1871 年，胡伯納曾抱怨佛寺中無人可以提供更詳盡的解說，而短短數年，京都佛寺內已有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識皆可與西方人溝通的人員。然而，卓瑟書中主要關注，在於西本願寺之建築，以及其上之雕刻與裝飾的細節，而非宗教思想或寺中文物的內涵，反映出個人的興趣取向。

放在文化史發展背景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轉變。由胡伯納旅行的 1871 年，到卓瑟旅行的 1876 至 1877 年，雖然僅有數年之隔，但日本對於古代文物調查、整理，已有多方面的進展。1872 年，日本政府進行了首次古文物調查，包括京都、奈良一帶的古寺文物。另一方面，日本積極參與世界博覽會，也帶動對於古文物的關注。雖然送至博覽會的大宗品項為當代製作的工藝品，但亦有古代文物或複製模型。如 1873 年的維也納博覽會中，便展示了鎌倉大佛模型、東京谷中天王寺五重塔模型等。⁷⁶ 雖然 1870 年代中期，日本文物保存工作剛剛起步，尚未編纂成系統性的資料或書籍，但由卓瑟旅行紀錄看來，當時能夠提供給外部觀察者的資料，顯然更為豐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有能力並有意向與外國人士溝通的人員頗多，且不但背景多元，連官方位階也頗高。除了推動博覽會、博物館事務有關的高級官員，常主動與西方人士互動之外，連位居內務卿（相當於內政部長）的大久保利通，都關注與工藝活動有關的來訪人士。除了官方的活動，寺院方也有所作為。最突出的

⁷⁴ 與西本願寺有關的內容，參見 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pp. 143-144.

⁷⁵ 赤松連城，可參考：Judith Snodgrass, *Presenting Japanese Buddhism to the West*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152-153.

⁷⁶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頁 65-72。並請參考：維也納博覽會中日本展件之照片「天王寺五層塔模型」。圖版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0308794/www.ndl.go.jp/site_nippon/viennae/data/100318.html），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1 日。

是西本願寺，派遣僧侶留學，並歡迎西方人士來訪。其他寺院雖未必如此積極，但接受外國人參訪的京都古寺，數量也逐步增多。

肆、1879 年海軍建築師瑞德的京都之旅

本文最後要討論的例子，是 1879 年初訪日的英國海軍建築師瑞德。本文處理的數種文本中，瑞德之寫作是最缺乏現代學者關注的，或許是因為他並不如杜黑、卓瑟般與藝術文化有較明確的關聯，他的書籍也並不像胡伯納之作那樣暢銷。然而，一位非宗教學、東亞史學、藝術學或藝術評論專長，且僅是短暫訪問日本之作者的旅程與寫作，卻可以提供例證，使我們了解，即使非歷史或藝術史專長的西方知識份子，亦有廣泛的關注層面。

瑞德的專長為設計並監造軍艦，1863 年，年僅 33 歲，即登上英國海軍首席建築師之位。1874 年，更被選為下議院議員，於政治上也相當有影響力。除了在英國活動，他也為其他國家設計軍艦。⁷⁷ 瑞德的日本之旅，主要是為了交付委託他設計監造的軍艦。出發之前，瑞德就向日本官方提出在日本旅行的請求。這項請求，於歡迎瑞德抵達的宴會上，由當時的太政大臣（職位相當於內閣總理大臣，瑞德稱 prime minister）三条實美（1837-1891）宣布同意。⁷⁸ 由日本的外交檔案可知，瑞德來訪之前，日本官方就認定他是一位公私方面皆頗有威望之人，對日本海軍與外交可有裨益。為了招待他，還撥款五千圓給海軍省最高長官川村純義（1836-1904）⁷⁹ 修繕住宅，作為瑞德在東京的居處。⁸⁰ 他在 1879 年 1 月 10 日抵達，先完成交付艦艇的主要任務後，於日本境內旅行了大約三個月，所行之處包括神戶、廣島、長崎、

⁷⁷ 參見 Wikipedia, "Edward Reed (naval archite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Reed_\(naval_architect\)](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Reed_(naval_architect)) (accessed August 22, 2020).

⁷⁸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80) p. 21. 三条實美為最後一任太政大臣，任期為 1871 年至 1885 年，此職後改為內閣總理大臣。

⁷⁹ 當時日本海軍省最高長官之官銜為海軍卿，瑞德書中稱為 minister of marine。川村純義出身薩摩藩，在明治政府內頗受重用。

⁸⁰ 李啟彰，〈井上馨による外交「裏舞台」の創出—鹿鳴館の建設過程からの考察〉，《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 22 號（2011），頁 145-166，此資料出自頁 149。

大阪、奈良、京都、伊勢、名古屋、箱根等。瑞德與卓瑟不同，訪日之目的與接觸的主要官員，與文物保護或博覽會事業並無直接關聯，但在京都仍參訪諸多古寺。卓瑟為工藝設計師，他的旅行具有明確的任務，即給予日本工藝製作建議，使之更為進步。瑞德並沒有與工藝製作或宗教、美術相關的任務，仍被安排參觀了諸多京都寺院，可見當時日本方面很可能認為讓外國旅人參觀寺院是頗有意義的。由於相關資料闕如，目前僅能由序言中作者一再地表達謝意來推測，日本官方必定給予他相當多的協助。他感受到「天皇、各部會首長，與日本人民，都衷心渴望推動與西方國家的友善交流，提升禮遇與善意」。⁸¹

瑞德返國之後，次年出版了《日本：其歷史、傳統、宗教，併記 1879 年之旅》（*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一書。此書分為兩冊，多達 800 餘頁，內容豐富。上冊整理了日本歷史文化背景，下冊則是 1879 年的旅行實錄。瑞德於序言中寫著，他一開始並沒有寫書的計畫，但在旅行中卻萌生寫作的想法。並且，他認為如果單記旅行，而無日本歷史文化介紹的話，可能讀者無法明白他所見所聞的意義，因此增加了許多篇幅。作者坦言，書中有許多內容乃由其他資料編纂而來，而非親筆新論。不過，由於瑞德引用資料與描述親身經驗時的筆調清楚，因此讀者可以辨識出來。此外，我們也可留意，由這本書的編寫方式，可知在 1870 年代後期，即使不是長期旅居於日本的作者，已經可找到相當多以西方語言出版的日本歷史文化資料，足以與親身體驗的旅程相互參照。

瑞德於 1879 年 1 月抵達橫濱之後，於關東地區參訪約一個月。之後，乘船到神戶，訪問廣島、長崎，再返神戶。由神戶經陸路前往大阪，再到奈良、京都，在京都的時間是 1879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4 日。⁸² 瑞德寫著，他們由大阪乘火車到京都，一到京都，就由知事（京都府長官，governor）安排住在建仁寺內。當時的

⁸¹ 原文：“The author would repeat here what he has elsewhere said, and express his conviction that the unbounded kindness shown to himself and son were due in no small degree to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the ministers, and the people of Japan are heartily desirous of promoting friendly intercourse, courtesy, and good feeling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and with none so much as with ourselves.”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1 (London: J. Murray, 1880), p. viii.

⁸² 與京都有關的內容為第二冊第九章，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p. 179-230.

知事是對京都建設頗有貢獻的榎村正直(1834-1896)。⁸³ 瑞德對居住房間內的擺設，描述相當仔細。他指出，房內既有歐洲式的桌椅、床和家具，也有京都當地所作的毯子、絲織品的桌巾、琺瑯雪茄盒，和瓷製用品。房間內的擺設，除了屏風、掛軸之外，還有銅器、瓷器和漆器。他還指出接待者十分用心，擺設品每日更換，以增加房間的吸引力。此外，房外還有美麗的庭園，「晴天時就是一個小天堂」。⁸⁴ 1870年代旅行於京都的西方人士，多對寺院的庭園印象深刻，但瑞德書寫最讓人注意的，便是佛寺域內之住宿處擺設歐洲式的家具，可見京都的接待者，頗有意識要配合西方旅人的需求。尤其是桌椅和床這類大型物件，並非如小擺飾般可臨時增添，需要提早調整內部空間，顯示早有規劃。

瑞德書寫，於建仁寺內的住宿處稍作休息後，前往附近的圓山，由高處眺望京都。接著，前往東大谷、知恩院。他提及有「山本先生」簡要的手冊可參考。據筆者研究，此指京都府顧問山本覺馬(1828-1892)建議為外國人編纂的英文觀光手冊。1871年(明治四年)，京都舉辦了首次博覽會。會後，地方人士成立了「京都博覽會社」的組織，並於1872年舉辦第一回正式會事，之後年年於春季舉辦。籌辦期間，主辦單位為了方便外國訪者，特別規劃了旅館、餐飲的安排。⁸⁵ 山本覺馬進一步建議應編纂觀光手冊。此手冊《為外國訪者編寫的京都與周邊名勝導覽》(*The Guide to the Celebrated Places in Kiyoto & the Surrounding Places for the Foreign Visitors*)於1873年發行。⁸⁶ 由瑞德的引用，可知這份手冊不僅於京都博覽會期間(通常是四月前後)通行，其他時間的來訪者也可能參照。英文的編寫使外國旅人得以大略了解京都的有名地點。瑞德於書中引用了一些段落，描述東大谷與知恩院。此處引用有關知恩院的小段：

⁸³ 榎村正直任職京都知事期間為1875年7月至1888年1月。

⁸⁴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180.

⁸⁵ 與京都博覽會有關的資料，主要參照：(明治)京都博覽協會編，《京都博覽會沿革誌》全3卷(京都：京都博覽協會，1903)。

⁸⁶ K. Yamamoto, *The Guide to the Celebrated Places in Kiyoto & the Surrounding Places for the Foreign Visitors* (Kyoto: Niwa, 1873). 並請參見：丸山宏，〈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覽會〉，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覽會の研究》，頁221-248，特別是頁244。

知恩院，即去年（1872）春季博覽會舉行之所，是京都一個大型且最為壯麗的寺院。此寺由源空，一位成功的佛教僧侶，為了於全國傳布宗教於 1202 年創立。現有建物，相當巨大且出色，是由傳奇的木匠左甚五郎所建。此處還有一座大鐘，由上到下有 18 英尺高，厚度達 10 英寸，位於建築物東南側的小丘上。

87

山本編纂的手冊僅有 48 頁，景點介紹相當簡要，但至少可讓訪者得知京都寺院的個別特點。文中所提的源空，即法然上人（1133-1212），是日本淨土宗的始祖。⁸⁸ 知恩院的現有建物（十九世紀至今，變化不大），多為江戶初期所建。今日嚴格的學術研究，並不能完全確認傳奇工匠左甚五郎的事蹟，但至今（2022 年）一般的觀光介紹仍稱知恩院為其所建。⁸⁹ 對比卓瑟書中知恩院的段落，也提及「著名工匠」，但無左甚五郎之名。山本的英文介紹手冊，確實可讓西方人得到越來越詳盡的資訊。此外，知恩院鐘，與京都方廣寺鐘、奈良東大寺鐘齊名。⁹⁰ 巨大的鐘與鐘樓，應該很容易讓外國訪者留下印象。

依《日本：其歷史、傳統、宗教，併記 1879 年之旅》一書所記，瑞德於京都前後共有九日，參觀的寺院數量非常多，除了東大谷、知恩院之外，尚有銀閣寺、真如堂、黑谷、金戒光明寺、南禪寺、東本願寺、東寺、西本願寺、西大谷、清水寺。而由琵琶湖方向離開京都之日，也參觀了郊外的石山寺。若對照今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銀閣寺、東寺、西本願寺、清水寺，皆列於 1994 年指定的「古都京都的文化財」中。此外，瑞德寫著，有些寺院他本想參觀，但因預定前去之日氣候不佳而取消行程。比如宇治的寺院，由照片看來是一極為美麗的河邊處所，但因大雨導致路況惡劣而無法前往。⁹¹ 此處指的應該是位於宇治川旁的平等院鳳凰堂，前述卓瑟曾

⁸⁷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182. 筆者對照引文與 1873 年原書，文字僅有數個字不同（如省略 as you know），不確定 Reed 參考的是與筆者所見不同的版本，或是他自己修改。

⁸⁸ 知恩院歷史參見：菊池勇次郎，〈法城：知恩院と東西本願寺の成立ち〉，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東京：集英社，1982），頁 90-94。

⁸⁹ 觀光訊息參見本文前節知恩院官網資訊，專業研究參見：平井聖，〈淨土寺院的建築〉，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頁 95-102。

⁹⁰ 知恩院鐘為重要文化財，1636 年造，重達 70 噸，參見〈知恩院の建造物〉，知恩院官網。

⁹¹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227.

經參訪過的寺院。鳳凰堂今日已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由瑞德的說法可知，當時已有一些寺院照片流通，可作為旅人之參考，可見十九世紀後期已經頗有名聲。

瑞德參觀的寺院，包括了許多不同的佛教宗派，並有迥異的歷史淵源。他對於每一寺院的書寫繁簡不一，但多簡要寫出創建年代、宗派、創始人等。他也注意到了寺院的創始年代，與現存建築的年代並不一定一致。古代寺院經火災或戰亂而損毀的狀況頗為常見，故寺域中的各個建物與佛像，常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對於今日的研究者，特別是美術史的研究者而言，區別寺院本身的歷史與個別實存物件的歷史，是極為關鍵的事。瑞德的書寫，顯示對於寺院不止於概括性的認識，而是對於寺中現存物件的個別淵源與特質，追求具體明確的認知。

在此討論銀閣寺、東寺、西本願寺之例，以便更加了解瑞德旅程經歷之特色，以及他的書寫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前面提及瑞德參考了 1873 年山本編纂的簡要英文觀光手冊，但《日本：其歷史、傳統、宗教：併記 1879 年之旅》書中部分文字，甚至比山本手冊篇幅更長，且實質內容更為豐富，顯然有其他的資訊來源。除了由參觀現場可能獲得資訊之外，瑞德於序言提及，他由日本亞細亞協會（日本アジア協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1872 年創立）的會刊中得到很多資料。⁹² 不可忽略的是，早在 1870 年代，除了直接由日本人獲得資訊之外，諸多外國人士已著手研究日本的歷史、宗教、美術，並且有交換資訊的管道。除了會刊之外，他特別提及在日本的英國人，尤其是薩道義（Ea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日文名：佐藤愛之助、アーネスト・サトウ），對於日本的深刻瞭解。並指出薩道義正在編纂一本日本導覽書。⁹³ 這本書，即是《日本旅行手冊》（*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1881 年於橫濱、上海、香港首度發行。⁹⁴ 1884 年，手冊

⁹²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1, p. v. 日本亞細亞協會於 1872 年創立，參見：日本亞細亞協會官網（<https://www.asjapan.org/>），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9 日。有關此協會的研究特點，參見：楠家重敏，《ジャパノロジーことはじめ：日本アジア協会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17）。

⁹³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3.

⁹⁴ Ernest Mason Satow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Being a Guide to Tōkiō, Kiōto, Ōzaka, Hakodate, Nagasaki, and Other Citi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Main Island; Ascents of the Principal Mountains; Descriptions of Temples; and Historical Notes and Legends* (Yokohama: Kelly & Co.; Shanghai &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81).

增補內容之後，發行地除橫濱、上海、香港之外，新增倫敦一地。或可推知，原來的發行地皆在亞洲，可能以旅居亞洲的西方人士為主要對象，後來新增倫敦，預期的讀者範圍更廣。瑞德訪日的 1879 年，旅行手冊尚未出版，但他頗有可能已透過薩道義而得到一些資料。

與銀閣寺有關的段落中，可以讓我們看到 1870 年代後期的西方旅行者，在寺院中可以得到什麼樣性質的參訪體驗。瑞德指出，這是足利義政（1436-1490）創立的寺院，除了佛殿之外，還有茶室、銀閣。⁹⁵ 此寺主要供奉阿彌陀佛，但銀閣的二樓則是觀音殿。瑞德特別寫到，他參觀了寺中的茶室，是一個僅有四又二分之一榻榻米大的小房間。他知道這是舉行茶道儀式的空間，但並未在此體驗茶道。⁹⁶ 書中還寫著，足利義政以贊助藝術活動聞名，而主要顧問是相阿彌（?-1525）。相阿彌多才多藝，雕刻、繪畫、茶道等樣樣精通。寺中僧侶帶領他們看了相阿彌的障屏畫，也展示一些狩野正信（1434-1530）的繪畫。瑞德並且記下，古代之僧人與世俗高層，曾於此寺中進行茶道、品香、賦詩等文化活動，部分詩作保留於此。另一方面，瑞德指出，在銀閣寺境內，看到一些小神社。他曾聽聞，日本的神道與佛教信仰，在過去是彼此交融的，神道之神，被視為佛之化現，而目睹佛寺之內的神社，可充分知曉此歷史軌跡。

瑞德的書寫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比起之前的西方作者，他更深刻地關注參訪之處的歷史淵源，且有更具深度的認識。在旅程中，瑞德被一一帶領參觀了佛殿、茶室等內部空間。他不僅記下銀閣寺創立者為足利義政，更理解到室町時代，貴為幕府八代將軍的義政，曾以寺院作為品鑑繪畫、茶道之所，僧俗共同進行活動。相對於創立者為某人這類明確的訊息，瑞德了解的是佛教寺院作為文化藝術場域的歷史特性。親臨空間現場，確實能使人對古代日本文化的特質有更深層的認知。雖然文中並無進一步申論意涵，但他明確記下茶道空間僅有四又二分之一榻榻米大，多少意識到此空間的窄小與含蓄。此外，瑞德也觀察到日本宗教史上的特殊發展，雖

⁹⁵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p.187-189.

⁹⁶ 銀閣寺歷史與寺院配置，參見：有馬賴底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1 銀閣寺》（京都：淡交社，2007）。有關茶室，參見：村井康彥，〈四畳半とはなにか：空間の精神史〉，有馬賴底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1 銀閣寺》，頁 106-111。

然並沒有於書中寫出「神佛習合」這個專有名詞，但對於神道與佛教交融的歷史狀況有所認識。⁹⁷ 另一方面，我們可知，瑞德有機會看到代表性畫家相阿彌、狩野正信的繪畫作品，並在書中標出了這些畫家的名字。⁹⁸ 相對於以前的西方旅者，瑞德對於繪畫的關注較高。日本寺院建築的壁面或拉門多附有繪畫，但前人並未加以記錄。不過，瑞德雖記錄目睹了寺院中知名畫家的畫作，並未對畫作本身作更詳細的描述或評價。另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是瑞德對於東寺的記載。⁹⁹ 瑞德先指出，東寺為日本真言宗主要寺院，又稱教王護國寺，為弘法大師（空海，774-835）所創，接著標出了東寺的主要建物：西院、食堂、講堂、金堂、塔。¹⁰⁰ 他列出每一建物中供奉的主要佛像名稱，並對食堂有更仔細的描述。他寫著，陪同的僧侶一一解說寺中文物，並特別告知：食堂屋頂上的龍圖，於六十年前繪製，畫家獲得 200 圓的酬勞。¹⁰¹ 文中補充，他並不是很清楚這樣的酬勞，表示費用高或低。這段簡短記述，頗生動地讓我們看到寺僧與西方人士，針對寺中現場可見之物對話的實況。

另一方面，瑞德對於所見之物，不時表達自己的看法，並非完全依日本人員的介紹紀錄。書中對所記的東寺文物，雖無逐一表示見解，但某些評價顯然有美感感受的取向，而非僅是客觀資料的認知。比如，他指出塔中的佛像頗為雜亂，相對地，寺中的梵天像，則較為可觀（more remarkable）。此外，雖詳細地記錄了東寺的堂宇與文物，瑞德於段落之末寫著，東寺極大的魅力來自於寺院的所在地，諸建物座落於樹木繁密的庭園中。他並感嘆，英國的宗教建物周圍，缺乏如此清新的空氣與美好的樹蔭。

而在 1870 年代早期就積極因應時代新發展的西本願寺，瑞德受到更加細膩的

⁹⁷ 有關「神佛習合」，參見：高木昭作、末木文美士，《日本文化研究：神仏習合と神国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5）。

⁹⁸ 有關相阿彌、狩野正信的畫壇地位，參見：山下裕二、高岸輝監修，《日本美術史》（東京：美術出版社，2014），頁 138-160。

⁹⁹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p. 210-212. 東寺之整體狀況，參見：梅原猛、砂原秀遍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 東寺》（京都：淡交社，2006）。

¹⁰⁰ 西院指御影堂，建物位置參見：〈境内のご案内〉，東寺官網（<https://toji.or.jp/guide/>），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9 日。

¹⁰¹ 東寺食堂於 1930 年火災中焚毀，3 年後重建，故今日無法見到瑞德所見的天井。食堂中原有一尊六公尺高，平安時代的千手觀音，此尊像現存於東寺寶物館內。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210.

對待。他受西本願寺法主之邀，到寺院內用餐，書中描述了整個招待的過程。用餐之前，一行人先被引導到一處有庭院的屋內，進行品鑑香木（香道）的體驗，並由法主大谷光尊（1850-1903）親自陪伴。¹⁰² 瑞德寫著，法主是個相當年輕且英俊的人。體驗過程中，不同的香木燒著，寺中人引導客人感受、辨識香氣，瑞德自言印象非常深刻。香道之後，寺方又展示了一些書法、繪畫等，並且強調西本願寺和「太閣」（Taiko，指豐臣秀吉）的淵源。瑞德對於晚宴餐點與舞蹈表演也有記述，尤其是舞蹈表演，他簡要描述了三段舞蹈的不同特點，且記述由寺方說明而得知分別源於印度、中國、日本。除了種種文化體驗之外，瑞德也寫出當時曾與赤松連城對談，還提及對談之內容包括信仰佛教與基督教之社會的特性。¹⁰³ 瑞德的書寫，顯示此時西方人在日本寺院中，可能獲得豐富多樣的經驗。這段歷時頗長的參訪過程，除了參觀寺中建築與庭院之外，還經歷了香道體驗、欣賞書畫、舞蹈，也被招待了餐點，並與英語流利的僧侶進行知性對談。瑞德於書中表示印象深刻的事物，相當多元，有些是寺院建築或裝飾本身，有些則是其中經歷的體驗，或遇到的人物。雖然未必每一位西方人士都能獲得這樣的接待，但也可知京都具悠久歷史的寺院，若有與西方重要人士交流的場合，已經可以熟捻地對應。

伍、結論

本文探索的，並非日本古寺文物於現代社會成熟後的新定位，而是企圖觀察異文化碰觸初始階段的書寫活動。明治年間，透過文化財整理、博物館收藏、美術史書編寫，古寺相關物件的文化角色隨之轉變並定型。然在明治初期，儘管有少數官方調查活動，但官方或學界都尚未有系統化之專業編纂，此時來自異文化圈人士的書寫，特別可讓我們觀察到相關物件意義轉型的最初歷程。本文討論了 1871 年至 1879 年至京都旅行的五個例子，除了居美之例為整理學者研究之外，其他四個皆根據旅行者本人的書寫。這幾位旅行者赴日的目的不同，文章書寫的風格也不一，難

¹⁰² 當時西本願寺法主為大谷光尊（1850-1903），法號明如上人。明如上人於 1872 年繼承法主之位。

¹⁰³ Edward James Reed,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p. 214.

以作量化的比較。但透過遊記內容的剖析，我們仍可觀察到，從 1871 到 1879 年，不到十年的時間之內，京都古寺與西方旅人之間的互動已產生了頗多變化。1871、1872 年造訪京都的胡伯納、杜黑，僅能得到概略的資訊。於《走遍世界各地，1871》一書中，胡伯納便曾抱怨，即使對於京都的寺院相當感興趣，但心中的問題無人可以解答。而 1876 至 1877 年旅行的卓瑟、1879 年的瑞德，則有機會獲得細節相當清晰的訊息。特別是瑞德所記，不但面向極為豐富多元，且內容頗具深度。他所獲得的，並非只是某寺院為某人所創，或宗派為何之類的單純訊息，而是寺院作為多樣文化場域的歷史複雜實態。在銀閣寺之旅中，他對於室町時代日本上層人士，以寺院作為品鑑藝術之所的狀況，以及日本佛教與神道交融的獨特發展，皆有所領會。於觀覽東寺堂宇尊像的過程中，一方面顯示知曉複雜的佛教圖像學知識，另一方面則表達個人對於雕像的美感判斷。於西本願寺，則經歷佛寺中的香道體驗、觀覽書畫與舞蹈，並與留學過英國的僧侶會談。整個過程，瑞德並非僅依語言或文字的解說，來認知與他自身背景差異甚大的東亞文化圈，而是透過親臨空間、親見實存物件或動態活動（舞蹈），甚至是嗅覺體驗（品香），得到頗具實感的瞭解。

由於寫作體例的限制，這些作者並無一一註解資訊來源，我們無法明確辨析，書中所記的訊息，是由京都當地政府的導覽人員、個別的寺院人員，還是作者認識的日本高層人員，或其他外國人士所提供。不過，由瑞德所記，可以看到至遲到 1879 年，離明治維新僅十年左右，日本便有多種層次的人員，因應文化態勢變化，而作出具體回應。1872 年的王申檢查，是中央政府人員調查整理古物的開端。雖然此調查之後，並無立即發展出有系統的整理，卻顯示官方開始重視古物的價值。同樣地，針對地位顯赫的外國旅人訪問京都，於 1870 年代似乎尚未形成接待的規範，但已可見中央人員，無論是與博物館事業相關或不相關的官吏，皆頗積極協助參訪古寺。京都地方政府則更為主動，除了個別的協調安排之外，1873 年有英文導覽手冊的發行，顯示嘗試建立與外國旅人溝通管道的意向。寺院人員方面，特出者如西本願寺，1872 年便派僧侶到英國留學，寺院也常積極招待外國旅人。除了西本願寺之外，由本文舉出之實例看來，願意接受外國旅人參訪的寺院實為數頗多，並且包括了歷史上有關鍵地位的著名寺院。這些記於外國旅人遊記中的交流歷程，在在顯示，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甚至是個別的寺院，都意識到時代的轉變，並有意願採取各種


不同層面的措施，使得京都古寺及其所屬文物，於短時間內便逐漸適應新觀覽者的興趣。筆者並非指古寺原有的角色完全改變——寺院面對本地的信仰者仍保有宗教的功能，但他們對西方訪者的接待，顯然發展出了新的意義脈絡。

另一方面，除了日本人之外，居於日本的西方人士，於古寺文物意義的轉型歷程，也扮演重要角色。如前所述，今日學界中無論是日本或西方學者，經常提起美國學者費諾羅沙和岡倉天心在 1880 年代於法隆寺調查活動中堅持打開夢殿秘佛之事，並以此例作為古寺文物意義轉變的里程碑。然而，此事件戲劇化的過程，並不代表當時各個寺院與調查人員的立場必然對立。此外，我們也不應誤以為西方人士在明治初期僅以膚淺心態看待日本傳統。早在此事件之前，便可見到諸多外國人士涉入日本的歷史、宗教、美術研究。具體的研究內容，可見於 1872 年創立的日本亞細亞協會活動紀錄及其會刊。1879 年訪日的瑞德，既非歷史學者、宗教學者，也非藝術史專家或收藏家、評論家，卻能由日本亞細亞協會會刊中獲得豐富的內容。瑞德又特別提到薩道義對於日本的深刻瞭解，很可能透過與他的交談或資料交換，獲得相當多的資訊。1881 年，薩道義編纂的日本旅行手冊，在橫濱、上海、香港等亞洲城市首度發行。1884 年，手冊增補內容之後，除了亞洲城市外，也於倫敦出版，可見讀者範圍更加擴大。旅行手冊發行之後，資訊流通進入另一階段，而 1879 年瑞德之旅，則呈現了以英文書寫的旅行手冊資料尚未普及之前的參觀實況。

1870 年代的西方旅行者，很大程度必須配合日本官方的安排。然而「官方安排」，並不能當成是日本官方完全單向的主導。地方上其他人員的配合，特別是寺院方的意願，也是旅行的內容充實與否的關鍵。此外，西方旅人的興趣取向，也就是他們參訪古寺時的預期，以及面對寺院導覽時的態度與提問，特別是觀察古物的角度，更不能不加以考量。由 1870 年代的這幾冊旅行書寫，可見西方人對於京都古寺興趣頗高，且在過程中與導覽人員、寺院人員產生互動或問答。即使如胡伯納那樣，似乎並不想參觀數量太多的古寺，仍對於所見寺院頗有佳評。我們可以合理假設，由一次又一次的旅程安排之中，日本人也發現西方人對於古寺的興趣深厚，而有越來越細膩而深入的導覽。這種本地人士與異文化圈人士的互動，未必能如計畫書或劇本般完全由一方掌控方向，而是在雙方交流意願得到彼此積極回應的往復過程中，於時代之流裏沉澱出漸趨深刻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旅人並非專為古寺而來，但皆在京都的旅程參訪了為數頗多的古寺，且留下相對深刻的印象。或許因為他們並非學術專家，使得書寫內容難以於某一學科上呈現明確的影響力，過去少有研究觸及。然而，非專家書寫的遊記，正可呈現明治初期，即使身分並非歷史、宗教或美術專門研究者的西方知識份子，也能於京都古寺得到豐富的體驗。需要補充的是，由本文提及的旅行記中，西方人於其他地點也有參觀佛寺的紀錄，特別是鎌倉、奈良。有些旅者於東京、大阪的行程中，也寫進與當地佛寺相關的內容，但就該區域的旅程而言，篇幅不多。然而，京都的旅程，參訪古寺有突出的重要性，也有足夠的篇幅與豐富的內容，便於我們作多方探索。

1870 年代的西方旅行者，無論前期後期，對京都寺院的整體環境，特別是庭園與周圍環境的優美，都一致表示欣賞，甚至還以「想像不出比這裡更宜人的地方」、「小天堂」等詞語來形容。然而，對於寺院建築本身與院內的文物，前期的旅者僅有相對概略的關注。1870 年代後半的旅行者，對於寺院建築、古物的觀察與欣賞，則顯示出探究細節的明顯興趣。書寫的豐富內容，包括了旅人自身的觀察和感受、寺方人員的安排或對話、京都地方的英文導覽手冊的資訊，也有來自其他在日外國人的研究。由 1871 至 1879 年，短短幾年之間，西方人旅行書寫中的京都古寺樣貌，越來越清晰且多元地呈現。建築史面向、美術史面向、宗教文化面向上的意義等，一一於英文書寫中被觸及。此狀況反映出日本人和外部觀覽者，相互摸索後，發展出一種非屬原本文化圈人士得以理解的表達模式。所謂表達模式，筆者認為，不僅是日本官方或寺方提供的口頭或文字說明可能越來越詳細，還包括接待過程中的非文字表述，如引導到寺域中各式各樣的空間，並提供種類繁多的體驗。總之，透過多本旅行記的內容分析，可見背景或立場不同的單位或人士，雖對古寺文物有殊異的觀覽意念，但於明治最初期的十餘年時間，可見交流深度的提升。這些歷程，逐漸使京都寺院的建築或宗教物件，由個別寺院擁有，以滿足當地人士信仰或文化需求為主的存在，轉為納入世界文化史脈絡之中，成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基於對歷史的探求，或對美感感知的興趣而觀覽的對象。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探索的 1870 年代旅行記中，對於寺中繪畫、雕像的評價較少。相對地，1880 年代出版

的日本旅行手冊中，則可見對繪畫、雕像的積極評價，詳見其他研究分析。¹⁰⁴ 筆者認為，此現象反映了異文化圈人士接觸初期，對於繪畫、雕像的認可與理解門檻較難跨越，需要更長時間的磨合。

¹⁰⁴ 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頁 1-42；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 1880 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為中心的考察〉，頁 103-147。

【附表】1870 年代西方旅行者參訪的京都佛寺

	胡伯納 1871	杜黑 1871-72	居美 1876	卓瑟 1876-77	瑞德 1879	備註
東福寺	■			■		
西本願寺	■	■	■	■	■	世遺
金閣寺	■	■				世遺
知恩院	■	■?		■	■	
三十三間堂		■		■		
妙法院		■?				
清水寺				■	■	世遺
東寺			■	■	■	世遺
東本願寺			■		■	
建仁寺			■		■	
石山寺			■		■	
園城寺			■			
西大谷				■	■	
萬福寺				■		
鳳凰堂（平等院）				■		世遺
東大谷					■	
銀閣寺					■	世遺
真如堂					■	

金戒光明寺					■	
南禪寺					■	

註：由於寺院名稱尚未有標準拼音，且書寫內容較為簡略，杜黑是否參訪過知恩院、妙法院，暫且存疑。

資料來源：尾本圭子，〈解說〉，エミール・ギメ（Émile Guimet）著，岡村嘉子譯，《明治日本散策：東京、日光》（東京：Kadokawa，2019），頁 384-385；Christopher Dress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Joseph Alexander Hübner, Mary Elizabeth Herbert tran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9);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4).

徵引書目

一、古籍

(一) 日文

- (明治) 京都博覽協會編，《京都博覽會沿革誌》全3卷，京都：京都博覽協會，1903。
- (明治) 無編者名，《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東京：農商務省，1901，收入小路田泰直監修，《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復刻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 (明治) 《英国サウス・ケンシントン博物館長ノ英国及欧州諸国芸術品寄贈ニ關スル報告書：町田博物局長宛》，1876，早稻田大學中日古籍資料庫 (bit.ly/427AkoX)，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8月20日。

(二) 西文

- Anon., “New Book: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ember 21, 1874.
- Dresser, Christopher. *Japan: Its Architecture, Art, and Art Manufactur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82.
- Dresser, Christopher. “The Art Manufacturers of Japan,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Vol. 26, No. 1315, 1878, pp.169-178.
-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4.
- Fenollosa, Ernest Francisco.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1.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2.
- Guimet, Émile. *Promenades Japonaises*. Paris: G. Charpentier, 1878.
- Guimet, Émile. *Promenades Japonaises: Tokio, Nikko*. Paris: G. Charpentier, 1880.
- Hübner, Joseph Alexander.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 Paris: Hachette, 1873.
- Hübner, Joseph Alexander. Translated by Mary Elizabeth Herbert.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9.
- Jones, Edward Duffield. “Book Review: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The Academy*, Vol. 6, Iss. 133, Nov 21, 1874, pp. 578-579.
- Reed, Edward James.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2Vols. London: J. Murray, 1880.
- Satow, Ernest Mason,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Being a Guide to Tōkiō, Kiōto, Ōzaka, Hakodate, Nagasaki, and Other Citi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Main Island; Ascents of the Principal Mountains; Descriptions of Temples; and Historical Notes and Legends*. Yokohama: Kelly & Co.; Shanghai &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81.

Satow, Ernest Mason, and A. G. S Hawes.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Central & Northern Japan; Being a Guide to Tōkiō, Kiōto, Ōzaka, Hakodate, Nagasaki, and Other Citi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Main Island; Ascents of the Principal Mountains; Descriptions of Temples; and Historical Notes and Legends*. London: John Murray; Yokohama: Kelly & Co.; Shanghai &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84.

Yamamoto, K., *The Guide to the Celebrated Places in Kiyoto & the Surrounding Places for the Foreign Visitors*. Kyoto: Niwa, 1873.

二、專書

（一）中文

小島毅，郭清華譯，《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朱月華等編，《世界遺產全書》，臺北：墨刻出版，2018。

齋藤希史，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20。

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著，譚媛媛譯，《明治維新親歷記》，上海：文匯出版社，2017。

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著，趙瀟譯，《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二）日文

山下裕二、高岸輝監修，《日本美術史》，東京：美術出版社，2014。

山根有三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2：京の五山》，東京：集英社，1983。

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東京：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2001。

北澤憲昭、佐藤道信、森仁史編，《美術の日本近現代史—制度、言説、造型》，東京：東京美術，2014。

辻惟雄，《日本美術の歴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

吉田光邦編，《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變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

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會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

寺本敬子，《パリ万国博覧會とジャポニズムの誕生》，京都：思文閣，2017。

有馬頼底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1 銀閣寺》，京都：淡交社，2007。

有馬頼底、梅原猛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21 金閣寺》，京都：淡交社，2008。

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明治二年の東京遷都》，東京：講談社，2001。

- 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佐藤道信，《「日本美術」誕生—近代日本の「ことば」と戦略》，東京：講談社，1996。
- 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語る現在、語られる過去：日本の美術史学 100 年》，東京：平凡社，1999。
- 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日本における美術史學の成立と展開》，東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01。
-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
- 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
- 高木昭作、末本文美士，《日本文化研究：神仏習合と神国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5。
- 脇田修、脇田晴子，《物語京都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 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東京：集英社，1982。
- 梅原猛、砂原秀遍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 東寺》，京都：淡交社，2006。
- 関秀夫，《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2005。
- 菅原信海、みうらじゅん等著，《新版古寺巡礼京都 18 妙法院、三十三間堂》，京都：淡交社，2008。
- 楠家重敏，《ジャパノロジーことはじめ：日本アジア協会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17。
- エミール・ギメ（Émile Guimet），岡村嘉子譯，《明治日本散策：東京、日光》，東京：Kadokawa，2019。

（三）西文

- Chang, Ting. *Travel, Collecting, and Museums of Asian Art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3.
- Daniels, Gordon. *Sir Harry Parke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1865-1883*.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Ltd, 1996.
- Farr, Martin, and Xavier Guégan eds. *The British Abroad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Halén, Widar. *Christopher Dresser: A Pioneer of Modern Design*.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90.
- Snodgrass, Judith. *Presenting Japanese Buddhism to the West*.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 Sullivan, Michael.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巫佩蓉，〈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旅人對日本早期佛教美術之認知——以 1880 年代英文版旅行手冊為中心的考察〉，《新史學》，第 31 卷 1 期（2020），頁 103-147。

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藝術學研究》，第 27 期（2020），頁 1-42。

巫佩蓉，〈明治初期的正倉院文物展示與西方人之報導：古代珍藏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之早期例證〉，《故宮學術季刊》，第 40 卷第 2 期（2022）頁 163-206。

（二）日文

李啟彰，〈井上馨による外交「裏舞台」の創出——鹿鳴館の建設過程からの考察〉，《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 22 號（2011），頁 145-166。

（三）西文

Chang, Ti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Vol. 25, No. 1, 2002, pp.17-34.

Inaga, Shigemi. "The Making of Hokusai's Repu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Japonisme," *Japan Review*, No. 15, 2003, pp. 77-100.

Rambelli, Fabio. "Secret Buddhas: The Limits of Buddhist Representatio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57, No. 3, 2002, pp. 271-307.

四、專書論文

（一）中文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做為象徵的漢字——費諾羅沙與東洋〉，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20，頁 350-367。

（二）日文

丸山宏，〈近代ツーリズムの黎明：「内地旅行」をめくって〉，吉田光邦編，《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変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 89-112。

丸山宏，〈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覧会〉，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頁 221-248。

山田陽子，〈サウス・ケンジントン博物館と日本：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の運んだ 1876 年の寄贈品選定基準について〉，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

- 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14-24。
- 平井聖，〈浄土寺院の建築〉，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東京：集英社，1982，頁 95-102。
- 村井康彦，〈四畳半とはなにか：空間の精神史〉，有馬頼底等著，《新版古寺巡禮京都 11 銀閣寺》，京都：淡交社，2007，頁 106-111。
- 尾本圭子，〈解説〉，エミール・ギメ（Émile Guimet）著，岡村嘉子譯，《明治日本散策：東京、日光》，東京：Kadokawa，2019，頁 365-419。
- 佐藤秀彦，〈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の宝物調査〉，郡山市立美術館編，《クリストファー・ドレッサーと正倉院宝物》，福島：郡山市立美術館，2019，頁 6-13。
- 菊池勇次郎，〈法城：知恩院と東西本願寺の成立〉，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東京：集英社，1982，頁 90-94。
- 福田敏朗，〈圖版説明：金閣〉，山根有三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2 京の五山》，東京：集英社，1983，頁 142。

（三）西文

- Elliot, Andrew. "British Travel Writing and the Japanese Interior, 1854–99," in Martin Farr and Xavier Guégan eds. *The British Abroad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97-216.

五、學位論文

（一）中文

- 張育晴，〈十九世紀末法國人對日本繪本的詮釋——以 Théodore Duret 的著作為例〉，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0。
- 劉思涵，〈Rutherford Alcock 與日本藝術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1。
- 謝宜君，〈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日本：其建築、藝術和藝術製造》圖像研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20。

（二）西文

- Halén, Widar. "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 and the Cult of Jap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88.

六、網路資料

- 日本亞細亞協會官網（<https://www.asjapan.org/>），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8月22日。

- 東寺官網 (<https://toji.or.jp/guide/gojunoto/>)，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
- 京都ホテルグループ (https://www.kyotohotel.co.jp/history/chapter_01/chapter_01_02/)，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 維也納博覽會中日本展件之照片「天王寺五層塔模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0308794/www.ndl.go.jp/site_nippon/vienne/data/100318.html)，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1 日。
- 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s://www.cernuschi.paris.fr/en>)，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 〈王申檢査關係資料〉，e 國寶 (https://emuseum.nich.go.jp/detail?langId=zh&webView=&content_base_id=100815&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 〈知恩院の七不思議〉，知恩院官網 (<https://www.chionin.or.jp/highlight/wonders.php>)，最後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12 日。
- 〈知恩院の建造物〉，知恩院官網 (<https://www.chionin.or.jp/highlight/building/daishoro.php>)，最後檢索：2020 年 9 月 8 日。
- 〈境内のご案内〉，東寺官網 (<https://toji.or.jp/guide/>)，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9 日。
- UNESCO, “Historic Monuments of Ancient Kyoto (Kyoto, Uji and Otsu Cities),” http://whc.unesco.org/pg.cfm?CID=31&ID_SITE=688&l=EN (accessed July 13, 2020).
- Wikipedia, “British Japan Consular Servi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Japan_Consular_Service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0).
- Wikipedia, “Edward Reed (naval archite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Reed_\(naval_architect\)](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Reed_(naval_architect)) (accessed August 22, 2020).

(責任編輯：陳柏諭)